

石泉著

# 甲午战争前后 之晚清政局

生活·讀書

06

店

新  
知  
覺

PDG

98  
K256.06  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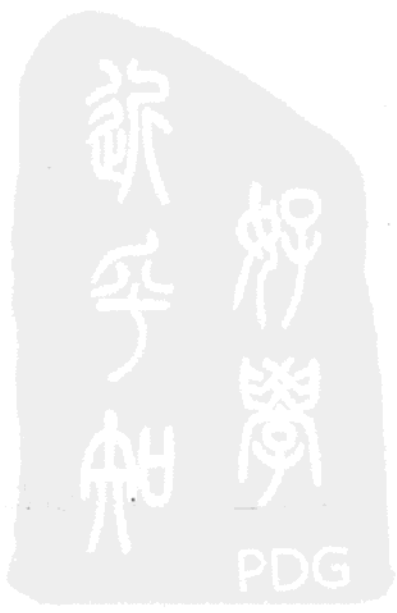


石泉著

# 甲午战争前后 之晚清政局

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/石泉著. - 北京:生活·读  
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97.11

ISBN 7-108-01064-X

I.甲… II.石… III.政治-中国-清后期 IV.D6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08096号

BAS/20

责任编辑 曾 嵩

封面设计 海 洋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 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
版 次 1997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 9.375

字 数 208千字

印 数 0,0001—10,000册

定 价 14.80元

新华书店  
PDG



石泉



五十年前的作者



陈寅恪先生四十年代后期在清华大学的住宅。五十年前，作者即在此接受陈寅恪先生的指导写作此书（1997年版）。



作者夫妇在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故居的书店（1994年版）。



## 序

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》是石泉教授受业于陈寅恪先生时所写的研究生论文，完成于1948年，至今已有半个世纪。在历经历史风雨尘埃的冲刷掩埋之后得以问世，是一件值得庆幸、令人欣慰的事。石泉教授命我赘序，非我学力所能胜任，但也不敢固辞，谨将读后之所感所得，述其概要，借以应命。不当之处，望石泉教授和读者指正。

据作者自序，这部书稿开始构思于1944年。这一年已是抗日战争的第七个年头。国民党政府军在豫湘桂大溃退之后，日军兵临贵州独山，云南震撼，川康不保，作者仍力学不辍于炮火声中，所深入周密审视研析者，乃半世纪前如斯一段历史，而所欲探明者则是：“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，仿效西方，而二十余年后，以甲午战争为标志，竟乃成败判然，国际形势、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，下启我国以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”诸问题，作者对此“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”（引文见作者自序）。可见，在作者心目中，甲午一战不仅导致中国国内政局、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而且更为此后更大动荡之造因，是为中国近代史上之关键性事件。所以，要懂得当代中国，不可不于此着手。简言之，作者是为深入认识当时的现实而研析这一事件的，寻究其前因后果、表相底里，借以求得历史与现实相统



一的通解通识,进而对当时的国情世态加深认识,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,知其源流、真况,而又明其发展趋势。从这里,我们看到,石泉教授在当时抓住这一课题孜孜以求,正是将民族命运、学术工作和个人人格心志三者合而为一,“述往事,思来者”(司马迁: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),“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,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”(陈寅恪:《读吴其昌撰〈梁启超〉传》书后)),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,尽自己的职责。这种合“身”、“心”、“家”、“国”为一体,集“沉静学者”与“热血志士”两种身份于一身的学风,远承屈子“忧国问天”、史迁“疾世著述”的优良史学传统,近则直接得自寅恪先生的言传身教,其迹十分明显。下面谨举数例,阐明石泉教授对寅恪先生学术之薪火传继。

人所共知,寅恪先生早年以治唐史著称。所以如此,固自有受往日留学诸国(日、美、德等)汉学界学术风气影响一方面原因(这一点这里不能展开),然而更直接更重要的原因,则在于先生认为,近代中国国势与唐代极为相似,因而治唐史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这样一番道理。这一点,先生曾在1944年向学生讲授“隋唐史”课程时有所说明。当时听课学生李涵有记录云:“应将唐代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”。“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,近百年来尤为显著”,而“唐代与外国、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,不仅限于武力之征战与宗教之传播,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。”又说:“近百年来中国之变迁极速,有划时代的变动,而唐代的变动也极为剧烈迅疾,如天宝以前与天宝以后便大不相同。”(以上引文见石泉、李涵《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》,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: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》第34页)唐代与近代这般相同的变动,又共同地为受外力及外部与内部相互影响所致,

欽  
定  
四  
庫  
全  
書  
PDG

可见，寅恪先生攻研唐史与唐代之颇为相似于近代中国关联极为紧密，说先生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、认识近代与现代中国而研究唐史，应不是无稽之谈。石泉教授研究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，与寅恪先生欣然同意指导此项研究，其间固皆有共同的内在学术思想渊源，而又共同地为现实感受所驱动，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事。

抗日战争中期(1940至1942年间)，寅恪先生居香港。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香港被日军占领。先生困居于此，闭门读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将港岛沦陷后之种种情状与书中所记汴京屈降后之各种异象，两相印证，忽觉自己过去读此书时“不甚可解者”，忽“豁然心通意会”。先生曾于《陈述〈辽史补注〉序》(载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)一文中记其事云：

回忆前在绝岛、仓皇逃死之际，取一巾箱坊本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，抱持诵读。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，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，国论是非之纷错，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，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，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，以相印证，则忽豁然心通意会，平生读史四十年，似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，而死亡饥饿之苦，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。

由此可见，先生之治史读史，无不时时立足于现实，着眼于现实，从现实的感受、现实的需要出发求对历史与现实的通观通解通识。“立足现实、回应现实”以治史，才能将世事与史籍两相会通，交融互释，得出深切之体认。细读先生的著作，便可看出，不仅对唐、宋史的研究如此，对魏晋清谈及其人物的评价研究，或是对陈端生、柳如是等杰出女子之着力表





彰等，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感受和着眼于现实的求索。研究的题目与对象似乎远僻，其实都往往是由于对现实的深切感受所驱动，与实际生活贴联得十分紧密。对先生著作的这种深层内涵，季羨林先生在《回忆陈寅恪先生》一文中有极其透辟明快的论述：

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“闭门只读圣贤书”的书呆子。他继承了中国“士”的优良传统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，他非常关心政治。他研究隋唐史，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，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亡的政治问题，可惜难得解人。（《怀旧集》第198—199页）

我认为，季先生此话为习读寅恪先生的著作提供了一把钥匙，同时也为我们今天阅读石泉教授的著作作了指引。

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》一书，可与寅恪先生之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参阅并读，盖后书目前所残缺之篇章，如《自光绪十年三月至二十年十一月间清室中央政治之腐败》、《孝钦后最恶清流》等，其基本内容，当可于前书中得其概貌。是故，此书亦可视为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一书之传承联袂之作。但此书作于半世纪以前，史料条件与认识水平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，论文衡事，岂得谓在在皆当，但可以断言的是，石泉教授这部少作、旧作，体现了中国良史之传统，其史学思想、史学方法与严谨的学风，都有其历史性的价值和切中时弊的现实意义。即以学风一端而言，本书对史料之搜集、考辨、研讨、分析，可谓详尽、透彻、深细。我相信，石泉教授这部著作的出版，必将多方面地有助于我国优秀史学传统之火继薪



传，亦将有益于史学工作之后来人，职是之故，遂敢于且乐于勉力为是书赞此一“序”。

刘桂生

1997年6月12日于北京大学  
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



## 自序

本文写成于1948年夏，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，是在先师陈寅恪教授指导下所作的硕士论文《中日甲午战争前后之中国政局》。此亦当时先师所指导学位论文中惟一属于中国近代史领域者。形成此一特例之原委，可追溯至1944年冬季。时先师因目疾致盲，在成都存仁医院手术后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夜间尤需人照料。做为入室弟子，我经常去值夜班。每当先师中夜失眠，则陪侍闲叙，兴之所至，几于无所不谈。某夜，先师问及毕业论文拟作何题？我率尔答称：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。近人王信忠先生已写成《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》一书，私意颇欲就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之内政背景进行探索：何以中国与日本同于19世纪60年代起步仿效西方，而二十余年后，以甲午战争为标志，竟乃成败判然，国际形势、国内政局皆因之发生重大变化，下启我国此后更为动荡之历史新阶段？拟寻究其所以然之故。当时虽有此愿望，实未敢信其必能实现，因先师当时之主要研究领域乃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史。不料先师竟予首肯，认为此题可作，并告知：“其实我对晚清历史一直是很注意的，不过我自己不能作这方面的研究，认真作，就容易动感情，那样，看问题就不客观了，所以我不作。你想要作，我可以指导你。”聆听之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此后即逐步搜集史料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实际上直至1947年春，始正式撰写。历时年余，终于完成。



写作过程中,进行每一章之前,皆曾向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,经首肯,并大致确定范围后,始着笔。每完成一大节或一小章(各章各节大小不等),则读与先师听,详细讨论后,定稿。先师对史料之掌握,极为严格:首先必须充分占有史料,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者,皆须尽力设法搜集、查阅,不容有丝毫遗漏;而选用于学位论文时,则又尽量筛汰,力求精炼。其次则尤注意于史料之核实,同一史事,尤其是关键性的记载,彼此有出入者,必须认真加以鉴定,确证其某一部分为史实后,始得引以为据。在观点方面,则持之尤慎,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。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,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,要求一一作出解答,必至穷尽各种可能的歧见,皆予澄清以后,始同意此部分定稿。其高度严谨之科学精神,对我此后一生的治学态度、途径与方法,皆有深远影响。

此篇学位论文亦颇历沧桑。当年清缮方毕,未及最后校阅,即逢国民党政府之“8·19”点名拘捕,仓促脱身离校,进入华北解放区。清缮本虽得师友帮助,代为上交学校,但解放后经院系调整,久已不知下落。而本人身边之底稿,亦在“文革”中荡然无存!原以为从此消失于世,空存追忆而已;岂料1991年获悉,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接收燕大图书馆的资料中,竟存有此篇在,遂于1993年前往复印全文。失而复得,快何如之!不仅重获四十余年前的研究成果,尤要者,此乃先师昔年精心指导,使我深受教益的物证,是弥足珍视的纪念品。

先师晚岁以口述方式,倩黄荃先生代笔,写成《寒柳堂记梦未定稿》,以记叙家世及父祖三代所经历之晚清政局,惜于“文革”浩劫中又复散佚,仅存残篇,经由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整理后,作为“附录”,收入《寒柳堂集》中(见《陈寅恪文集》之一,上海

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6 月版, 页 163—182)。先师于“弁言”中谈到写作此篇之心情与态度云:

今既届暮齿, 若不于此时成之, 则恐无及。因就咸同光宣以来之朝局, 与寒家先世直接或间接有关者, 证诸史料, 参以平生耳目见闻, 以阐明之……既不诬前人, 亦免误来者。知我罪我, 任之而已。(见《寒柳堂集》页 165—166)

又云:

清代季年, 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。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, 或以姻娅之亲, 于此清浊两党, 皆有关联, 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。因草此文, 排除恩怨毁誉, 务求一持平之论断。他日读者倘能详考而审查之, 当信鄙言之非谬也。(《寒柳堂集》页 167)

又于“弁言”之末句云:

寅恪以家世之故, 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。今日述之, 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?(《寒柳堂集》页 168)

据上所引, 可知先师此时已改交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, 决心在晚年亲自着手阐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, 自信已能“排除恩怨毁誉”, 作出经得起审查的公正论述, 以存信史而待后之识者。此亦足显示 师门三代人爱国之家风, 与史家的高度历史责任感!



追忆当年 先师指导写作本文时,亦持此种态度。在严师教诲下,自己一方面必须以认真审订的史实作为立论基础,不敢凭空臆测;另一方面则排除个人好恶等感情因素之干扰,力求对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作出公正客观之论述;由此确信:只有保持历史本来面目,认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,始能对后人具有真正之借鉴意义。

1949年以来,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中颇受重视,成果迭出,远逾过去。而关于甲午战争前后之清廷内政背景方面,作过较全面系统研究,并提出相应看法者,似尚未多见。如能借本文抛砖引玉,有助于此课题之进一步探讨,则所深幸!至于文中之观点与见解,由于当时学术环境与自身思想认识之局限,衡以现今标准,必有疏失之处,幸祈读者不吝见教。私付此文恐只能作为四十年代,建国以前之产品看待,自不能与当前科研成果已达到之水平相提并论也。本人久已转事荆楚区域历史地理之研究,现今工作与社会活动已臻饱和,又年事已高,更无余力再就本课题作进一步探讨,如能以此作为后人研究本课题之一块踏脚石,于愿足矣。

全文共分六章:第一章为甲午战前三十年间政局概观。第二章至第五章论述甲午战争期间清廷内部政局之变化。战争期间为时虽短,但因国内政治势力颇倚外患之日亟而乘机加强活动,通过谋划战局以兼遂其打击对手(实力派之李鸿章与淮军将领,中枢之孙毓汶等)之政治目的,终于随败局演变之同时,亦逐步形成朝局之重大变化,故以四章之篇幅,论述其迅速遽嬗之迹,与夫转折之焦点所在。第六章则概括论述战后政局新形势。

各章注释共926条,总计约二十余万字。此次公开发表,将题目改为《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》,以更求确切。



此文写于解放前 1948 年之北平，依当年母校风尚，行文例用文言，此次发表，除个别误字外，皆仍旧贯，借存原貌，以资纪念。

本篇之终能问世，得自内子李涵(缪希相)教授之督促鼓励，并承担了包括校改与联系出版等一切最繁杂的工作；在目前学术著作出版难的形势下，为了争取此书的及时出版，我们的一些至亲好友先后有王苗、刘阳、纪辛、孙晓林、刘涛、王蕾等同志为此竭尽全力，作出宝贵贡献；最后得到三联书店总编辑董秀玉、副总编辑周一与责任编辑曾蕾诸位的鼎力支持、热情帮助，责编仔细审校全文，提出修改意见，在版式、装帧、图片、印刷质量等方面精益求精，方便本书能以现在的面貌呈献于读者之前，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！

石泉(刘适)

写于珞珈山武汉大学寓所

1997 年 2 月



## 内容提要

本文目的,在观察甲午战争前后,中国内部情势演变之过程,明其所以为近代史上一转折点之故,以求与远东国际局势之演变相表里。

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,其内政上之基因,在于前此三十年间自强运动之未能大规模积极进行。推究其所以然,可得三大线索:其一,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,致使求自强之洋务工作,饱受牵制,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夫之矢的;其二,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,汉人新兴势力之崛起,使满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,变为地方分权,以致不可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心,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;其三,则北京满人统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,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援又从而推波助澜,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化,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。有此三端,甲午一战遂终食其果,后此政局形势乃迥异于前。

甲午战争历时年余,其间政局变迁之大端有四:其一,则李鸿章与淮军在日本与清流主战派夹击之下,声名扫地,大为失势,其三十年来在中国之首要地位,从此沦落。其二,则受抑十年之清流势力,在战争期间又东山再起,翁





同龢一系，尤为之重心，上结德宗，外联湘军，一方面猛烈打击李鸿章之主和，与淮军之战败；另一方面则力攻其十年来之政敌孙毓汶等，皆获相当成功，但其主战政策，则为太后所抑，亦由其惟事高论，无术挽败局也。其三，则经此一战，德宗与太后之见解益分歧，而宫廷内之矛盾亦愈演愈烈，“帝党”、“后党”之对立，乃逐渐表面化。其四，则经此一战，中国军队之弱点毕露，于是北洋新军，遂于战争末期，创建于小站。

战争以后，外患日张，国势日颓，中国政局遂失其稳定性。李鸿章既去，北洋军权渐归荣禄，而袁世凯接统新军，大加整顿，亦渐露头角。中枢则翁同龢主政，而清流势力因康梁维新运动之大起，又趋分化，上与宫廷矛盾相结，于是帝后党争益烈，遂终爆发戊戌之变，大局从此益不可问。而革命势力，则始于甲午，乙未间萌芽海外，随时势之推移，逐渐孳长，遂终成倾覆满清帝国之先驱矣。

新  
学  
社  
P  
D  
G